

一级学科视阈下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

罗平汉 石 瑶

2021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出《关于对〈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专业目录〉及其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的函》,在法学门类内新设置一级学科“中共党史党建”。将“中共党史党建”设置为独立的一级学科,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断强调党史研究和党史学习重要性,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并建立常态化长效化制度机制的题中之义,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客观要求。可以说,这一学科设置,回应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史学界几代学人不断建议设立中共党史一级学科的呼声。如何在设置“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建构能与其他学科交流互通、为知识界所广泛认可的中共党史学科,值得党史学界的进一步思考与探讨。

一、提升学术水准以适应学科地位的擢升

长期以来,党史学界对中共党史的学科性质已基本形成共识,即中共党史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的历史学科。2002年7月,龚育之在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主办的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研讨会上指出,中共党史学这门学科,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门科学,是以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一客观过程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科学,中共党史本质上是历史学科,但现实性很强,是一门历史学科和理论学科^①。这一说法为党史学界所普遍接受。也正是因为中共党史在强调历史性与科学性的基础上,需要兼具政治性、理论性与现实性,这就导致中共党史的学科归属问题长期存在分歧,出现了分属于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不同意见。

就学科建制而言,中共党史学科曾被划归为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与政治学理论、中外政治制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并列,这一划分方法被不少学者视作制约中共党史学科发展的制度性、体制性因素。近年来,党史学界普遍建议把中共党史提升为一级学科,在学科建制上不再简单划归于历史学、政治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等一级学科。而历史学界一些从事中共党史相关研究的学者,则呼吁中共党史学科应回归历史学科,或可作为与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史并立的一级学科。其实,这两种主张并非完全冲突,前者力图在学科建制上赋予党史研究以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党史研究发展的学科归属问题;后者则着眼于提升党史研究的学术化程度,更多从党史研究的学术规范和学术价值角度予以考量。

将“中共党史党建”设置为独立的一级学科,重新规设中共党史的学科地位,一方面明确了党史学科的归属与边界,解决了限制学科发展的体制机制因素;另一方面指明了中共党史区别于历史学之特殊性,即中共党史的研究对象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在追求与实现学术价值、学术功能的同时,还需发挥“教科书”“必修课”“营养剂”的作用,以实现“赓续传统、振奋精神”“明辨是非、统一思想”以及“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政治功能^②。

当下,在顶层设计上厘定中共党史的学科归属与学科层级问题后,如何提升中共党史的学术化

^① 李庆刚:《“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学科建设专业委员会成立暨中共党史学科建设学术讨论会”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5期。

^② 齐鹏飞:《“党史姓党”“党史为党”“党史为管”——百年党史与党的党史研究工作》,《江海学刊》2021年第6期。

水平,使其学术水准匹及学科地位的擢升,则成为学科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前有学者曾指出:“即使进入到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平在整体上仍不能同中国古代史和近现代史研究的水平相比,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①虽然该判断主要基于对20世纪90年代中共党史研究的评价,这些年来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已经有了一定进步,但党史研究的整体研究水平以及和相关学科和学术界中的认同与接纳程度仍有继续提升的空间。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加以推动。

首先,明确中共党史的学术规范和评价标准,以扎实的学理性研究提升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水准。有关部门多次强调要深化党史研究,不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提供有力学理支撑^②。中共党史研究队伍目前大体可以分为两支力量。第一支队伍主要由全国党校系统从事党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员、高校承担中共党史或相关政治课教学的教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及地方党史工作部门业务人员组成,其研究需遵循“党史工作是党的思想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③,力求实现学术性与政治性之平衡;第二支队伍主要由高校和社科院系统尤其是高校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教学与研究的人员构成,其研究更多强调遵循历史学规范,以“求真”“求实”“求解”为诉求。两支队伍以各自的研究为中共党史夯实了学科基础,相互之间的交叉、流动与对话推进了学科发展。然而,上述两种研究在研究方法、学术规范、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中共党史的学科共同体有所割裂,力量相对薄弱。

要推进中共党史学科建设,不应以学者所在的研究机构为据,将其从事的研究加以简单划界,应当打破隔膜与疏离,发挥党史学科共同体的最大潜力。这就要求在这一研究群体中建立共同的学术规范与评价标准,譬如党史研究应遵循历史学的方法与规范,在尽可能全面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入推理、论证的智识领域;党史叙事不应是简单线性的,应当考察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互动以及系统内部与外部之间的互动,尽可能展示党史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党史著作、论文应提升学术水准,经得起时间考验,形成更多有分量、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对恪守史学规范的共识、对更高学术境界的共同追求,是党史研究学术共同体得以维系的原因。但同时应当注意,学科共同体合力的发挥不应以抹杀学术个性化为代价,在坚持辩论与批评的原则之上,任何为推动党史研究作出的努力都应得到充分尊重。

其次,建构“大党史”理念,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版图。毛泽东曾提出研究中共党史的“古今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④。习近平总书记亦多次强调树立“大历史观”,即“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⑤。无论是“古今中外法”还是“大历史观”,事实上都是将中共党史置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的横纵坐标系中加以研究。所谓“大党史”,要求党史研究具备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与学术眼光。

近年来,将中共党史研究置于更广阔的范围内予以解读的声音不断高涨,可以说是党史学者与历史学者的共同呼声^⑥。一方面,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走向要求从相关学科中获得方法与借鉴,譬如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实现“跨学科交流”,以期实现学者理想中的党史与相关社会科学的交界、交叉以至交融。此外,党史研究还应观照和研究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政治力量。胡乔木很早就

① 杨奎松:《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② 《中办印发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年3月22日。

③ 这个说法是胡乔木在1990年3月8日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部门负责人座谈会”上提出的。参见金冲及编:《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页。

④ 《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00页。

⑤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4月1日。

⑥ 黄道炫:《关山初度:七十年来的中共革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20年第1期;吴志军:《无妨以更广阔的胸怀来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兼论学术观念的自我反思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曾指出,党史与中华民国史的分工不同——但要有视野,了解就说得上内行,要不就说得上外行^①。另一方面,随着党的全面领导的加强,中共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学术区隔已几近消弭,应逐渐打破党史与国史的学术边界,在强调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以及继续研究党史上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物的同时,扩大党史研究的范围。过去,党史、国史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研究重点方面的差别常被一些学者加以对照及强化。事实上,正如有学者观察到的那样,中国共产党作为统管一切的执政党保持并将继续强化统管一切领域的巨型功能,决定了党史研究涉及的范围将更加广泛而深刻,其实际研究对象和范畴理应涵括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一切历史内容^②。

总之,在当下建构一级学科的情境之下,党史学界亟须以“大党史”的理念,打破人为设置的既有边界,整合更为丰富的学术范畴与知识资源,扩展中共党史学科的学术版图,实现与其他学科的交流与对话。

二、规划中共党史的课程体系

中共党史的课程设置是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关键环节——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需要在课程中转化推广,科学、合理的课程设置能作用于党史知识的再生产,这关乎党史资政育人功能的发挥。伴随着中共党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中共党史的课程体系亦处于不断调适与整合的过程中。在建构“中共党史党建”一级学科的背景下,党史学界亟须重新规制中共党史在国民教育和干部教育双重体系下的课程设置。

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史课程的主要受众对象是革命干部及学生。中共党史作为课程的出现,可以追溯到1933年张闻天在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中央党校的前身)讲授《中国革命基本问题》^③。而真正将“中共党史”区别于“中国问题”设置为独立的课程,则始于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张闻天在关于党的组织工作的报告中指出:“高级党校——三个月至六个月,由县委以上的特殊人才组织之。功课一般可有: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与中国问题,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④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多次在中央党校作中共党史方面的报告,在关注党史学习的方法论和历史观之余,更多涉及党史上重要事件、重要人物的评价问题。马列学院时期,中央党校明确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共党史设置为主课。根据地各革命大学也开设中共党史相关课程。1937年,陕北公学创办后,依托中国问题研究室开设中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课程。此后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等革命学校延续开设类似课程。^⑤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党史课程的对象由党的干部扩展至高校学生及普通国民,成为党校和高校固定开设的政治理论课程,并在特定高校开设旨在培养专门人才的专业课程。虽然相关课程最初并不是以“中共党史”命名的,但实际内容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高校院系调整后,“新民主主义论”在高校陆续开设,后改为“中国革命史”,直至1959年确定为“中共党史”,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共同作为高校的四门政治理论课程。此外,1956年9月,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招收全国高校首届“中国革命史”专业本科生300人^⑥,开启了中共党史的学位教育。改革开放新时

① 金冲及编:《一本书的历史:胡乔木、胡绳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235页。

② 吴志军:《无妨以更广阔的胸怀来认识党史研究的学科属性——兼论学术观念的自我反思意识》,《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1期。

③ 《中共党史报告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451页。

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711页。

⑤ 耿化敏:《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3期。

⑥ 1956年5月,中国人民大学根据高等教育部的指示,设立历史系,下设中国革命史和马列主义基础两个专业,原直属校部的中国革命史教研室和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划归历史系;9月,历史系招收全国高校首届中国革命史专业本科生300人。1958年7月,历史系中国革命史专业扩建为中共党史系,何干之担任系主任,这是当时全国第一个以“中共党史”命名、专门招收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本科专业的学科系。

期以来,党史学界重建中共党史的学科体系与学术秩序,作为课程的中共党史重新肩负干部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双重任务。

笔者认为,“中共党史党建”提升为独立的一级学科后,高校应统一开设以中共党史为主的课程,如以“中共党史”或“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代替“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结构性调整 and 改革之“2005 年方案”中,“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作为“新四门”,与中共党史关联最为密切。从顶层设计来看,无论是近年来的党史工作部署还是思想政治工作安排,均强调中共党史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的重要性。2010 年印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就明确提出“把党的历史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公共理论课的学科支撑和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①。2022 年 3 月,中央《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强调“用好学校思政课这个渠道,推动党史更好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发挥好党史立德树人的重要作用”^②。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9 年 3 月 18 日召开的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③而从目前的课程开设情况来看,“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叙事逻辑和史实运用与中学历史有较大重合,由于时间跨度过长,又因为课程属于“纲要”性质,难免存在线性化叙事等问题,多少弱化了历史过程的复杂性,难以真正说明党在百年奋斗中取得重大成就的来之不易。目前,有高校开展了“四史”主题的讲座或选修课,但相较于常规设置的政治理论课,其效用仍有提升空间。因此,有必要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遵循,以百年党史为核心内容,开设“中共党史”或“中国共产党历史与理论”课程,将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吸收进教材,回应青年学生的理论关切。

对于培养本科、硕士、博士的中共党史专业教育,应首先解决学科点萎缩的问题,再完善中共党史学科点的课程设置。与近年来党对党史工作高度重视不相称的是,中共党史学科专业学位点萎缩严重。据相关调研统计,2011 年至 2021 年十年间,尽管中共党史本科学位授予单位从 5 个增长到 8 个,但中共党史硕士学位授予单位从 96 个降至 71 个,博士学科授权单位从 26 个降至 20 个。截至 2021 年 2 月,在 20 个中共党史博士学位授予点中,公布 2021 年招收党史专业博士生目录的仅有 11 个。^④这一学科发展态势与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需求严重脱节。为了扭转这一趋势,应当以“中共党史党建”提升为一级学科为契机,在全国重点马克思主义学院增设中共党史专业的学位点,扩大本科生招生规模。在此基础上,根据二级学科设置,重新规划课程体系,强调党史专业教育区别于通识教育的特点,在“大党史”学科视角之下加强对中共党史专业本科生的学术训练和学术培养。对于硕、博的专业课程,应避免与本科生的课程体系高度重复,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理论功底和科研能力。

中共党史课程在党校系统的课程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央党校各培训班次均开设有“中共党史专题研究”,在开展“四史”教育的新形势下调整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专题,在 2022 年春季学期开设“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专题研讨班,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精神设计课程体系。相较于高校的中共党史课程体系,党校的课程设置在面对过去的同时,与现实的语境联系更为紧密,例如在建党百年这一时间节点增设《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讲题,对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历史的讲授,更注

①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790 页。

② 《中办印发关于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的意见》,《人民日报》2022 年 3 月 22 日。

③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人民日报》2019 年 3 月 19 日。

④ 耿化敏:《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回顾与展望》,《大学与学科》2021 年第 3 期。

重从党的奋斗历程及启示角度加以阐发。尽管存在话语区隔，但“用学术讲政治”这一理想境界之发挥，依然离不开从党史学科的发展、党史研究的进展中获得给养。

三、打造高素质的中共党史研究队伍

党史研究队伍和机构是党史研究与教学的实践主体，无论党史研究水准的提升还是党史课程的设置与改进，均需要以高素质的研究队伍为保证，以党史的教学与研究机构为依托。目前，全国从中央层面到省、市、县（区）地方层面都有专门从事党史研究与教学的科研机构或工作机构，形成了研究中共党史的五路大军，亦即全国党校系统、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以及地方党史工作部门、高等院校、社科院以及军队系统的相关研究机构。其中，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分别在高校和党校两个系统的学科建设中曾发挥过引领作用。中国人民大学于2017年设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聘请中央党史党建研究部门、中央党校、高等院校著名学者50余人作为特约研究员。以2021年建党百年为时间节点，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15所高校新成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中心、系）”，作为独立或准独立的学科发展平台，为党史学科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然而，现有研究机构间缺乏行之有效的协作联系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发挥各自优势，形成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合力。笔者认为，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应进一步发挥引领作用，承担“出学术规范、出评价标准、出学术样板”之重任，并借助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等学术社团，举办高水平的学术会议、学术论坛，促进不同机构间的对话与互动。同时，党史学界的学术机构应多与历史学界从事党史研究的机构加强往来与对话。

此外，中共党史研究机构应各自打造高素质的研究队伍。现阶段，不同的研究机构在队伍建设方面均面临一定挑战。譬如，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有的地方党校将原本分设的党史与党建教研室合并，但由于党史研究相对来说出成果没有那么快，社会上的课程需要相对较少，导致一些原来从事党史研究的人员改为从事党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党史的教学与研究；高校则因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导致原来从事中共党史教研工作的师资力量有所分流，相当程度上削弱了研究队伍；全国及地方党史部门，存在队伍总量不大，队伍学历结构、年龄结构不合理等问题^①。当然，不同党史研究机构间也面临一些共性问题，如人员队伍面临新老交替，20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党史研究者已经或者接近退休，迫切需要新的接班人引领学科发展，而当下党史研究新生力量中的顶尖人才相对不足，需要更多优秀的党史专业人才^②。党史研究队伍的现状、党史学科提升层级后的现实需要，要求我们加强党史学科人才培养，特别是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的培养与遴选；在鼓励年轻人“坐得住冷板凳”的同时，完善相关的科研管理制度、科研评价体系和学术奖惩机制；打造一支理论水平高、各具学术风格又能协同攻关、具备较大社会影响力的学术队伍，为党史学科建设提供根本保证。

〔本文作者 罗平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石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讲师〕

① 曲青山：《关于党史工作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红广角》2012年第8期。

② 王炳林：《中共党史学科基本理论问题论要》，《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